

# 哲学研究

ZHE XUE YAN  
JIU

北京师范大学  
图书馆  
报刊室

B/2

6

1001

1991

# 哲学研究

(月刊)

一九九一年第六期

(六月二十五日出版)

编辑者：哲学研究编辑部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100732

主编：陈筠泉

出版者：哲学研究杂志社

印刷者：北京新华印刷厂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ISSN 1000-0216

国内统一刊号 CN11-1140

邮发代号 2-201

国外代号M15

定价 1.40 元

# 哲学研究

(月刊)

一九九一年第六期

---

## 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和发展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

李景源 (3)

---

## 近年来我国哲学的若干热点问题(续)

邢贲思 (13)

---

## 也谈社会主义的价值和价值观

——兼与王锐生同志商榷

刘井山 (19)

---

## 意识形态与科学

——兼评《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

姚大志 (24)

---

### ·关于建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盟(笔谈)·

## 从科技史角度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盟

张秉伦 鲁大龙 (32)

## 关于社会科学量化问题的思索

常满 (35)

---

## 论主客间认识关系的主体间情境

罗敏 (37)

---

## 再论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

周云之 (46)

---

## 孔子的尚义思想和义务论伦理学说

马振铎 (54)

## 中国佛教南宗禅的无法之法

邢东风 (61)

## 评陈法《易筮》的义理思维

刘宗碧 (69)

---

### ·书评·

## 气论与仁学之间的张力

——读《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

萧楚父 郭齐勇 (77)

## 科学批判的硕果

——读《实用主义大师杜威》

乐逸鸣 (封三)

---

### ·读者·作者·编者·

## 钱学森同志的一封信

(36)

---

# Philosophical Research (Monthly)

---

## Contents

-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s Thinking Line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Li Jingyuan* (3)
- Some Recent Hot Questions of Philosophy  
in Our Country *Xing Fensi* (13)
- On the Socialist Value and the Views of  
Value *Liu Jingshan* (19)
- Ideology and Science *Yao Dazhi* (24)
- On the Natural-Social Science Alliance—  
from a View of History of Science  
*Zhany Binglun, Lu Dalong* (32)
- Some Remarks on the Quantitative  
Studies of Social Sciences *Chang Man* (35)
- On the Inter-subjective Situation of the  
Cogn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Luo Min* (37)
- On the Object and Method of the Studies  
of Chinese Logic History *Zhou Yunzhi* (46)
- Confucian Thought of "Shang Yi" and His  
Ethical Theory of Obligation *Ma Zhenduo* (54)
- The Idea of "Wu Fa Zhi Fa" of Chinese  
Buddhism of Nan Zong Chan *Xing Dongfeng* (61)
- The Theoretical Thinking of Chen Fa's  
"Yi Qian" *Liu Zongbi* (69)

1 9 9 1

No. 6, June

---

**ZHIXUE YANJIU**

5 Jianguo Mennei Avenue  
Beijing, China

Distributor: China International  
Book Trading Corporation  
P.O. Box 399, Beijing China

---

# 哲学研究

(月刊)

一九九一年第六期

---

## 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和发展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

李景源 (3)

---

## 近年来我国哲学的若干热点问题(续)

邢贲思 (13)

---

## 也谈社会主义的价值和价值观

——兼与王锐生同志商榷

刘井山 (19)

---

## 意识形态与科学

——兼评《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

姚大志 (24)

---

· 关于建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盟(笔谈) ·

## 从科技史角度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盟

张秉伦 鲁大龙 (32)

## 关于社会科学量化问题的思索

常 满 (35)

---

## 论主客间认识关系的主体间情境

罗 敏 (37)

---

## 再论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

周云之 (46)

---

## 孔子的尚义思想和义务论伦理学说

马振铎 (54)

## 中国佛教南宗禅的无法之法

邢东风 (61)

## 评陈法《易筮》的义理思维

刘宗碧 (69)

---

· 书 评 ·

## 气论与仁学之间的张力

——读《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

萧慈父 邢齐勇 (77)

## 科学批判的硕果

——读《实用主义大师杜威》

乐逸鸥 (封三)

---

· 读者·作者·编者·

## 钱学森同志的一封信

(38)

---

# Philosophical Research (Monthly)

---

## Contents

-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s Thinking Line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Li Jingyuan* (3)
- Some Recent Hot Questions of Philosophy  
in Our Country *Xing Fensi* (13)
- On the Socialist Value and the Views of  
Value *Liu Jingshan* (19)
- Ideology and Science *Yao Dazhi* (24)
- On the Natural-Social Science Alliance—  
from a View of History of Science  
*Zhany Binglun, Lu Dalong* (32)
- Some Remarks on the Quantitative  
Studies of Social Sciences *Chang Man* (35)
- On the Inter-subjective Situation of the  
Cogn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Luo Min* (37)
- On the Object and Method of the Studies  
of Chinese Logic History *Zhou Yunzhi* (46)
- Confucian Thought of "Shang Yi" and His  
Ethical Theory of Obligation *Ma Zhenduo* (54)
- The Idea of "Wu Fa Zhi Fa" of Chinese  
Buddhism of Nan Zong Chan *Xing Dongfeng* (61)
- The Theoretical Thinking of Chen Fa's  
"Yi Qian" *Liu Zongbi* (69)

1 9 9 1

No. 6, June

**ZHIXUE YANJIU**

5 Jianguo Mennei Avenue  
Beijing, China

Distributor: China International  
Book Trading Corporation  
P.O. Box 399, Beijing China

# 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和发展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

李 景 源

今年的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纪念日。七十年来，我们党在革命和建设中所取得的一条最根本的经验，就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毛泽东思想不仅是革命理论和斗争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而且指出了如何把普遍原理运用于特殊国情的途径和方法，为党和人民提供了一条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同志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邓小平文选》，第242页）“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哲学命题，它高度体现了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的有机统一。就其内容而言，它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就其表现形式而言，它又是中国式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我们党对长期革命斗争中一系列独创性经验的理论概括，是中华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代表了中国理性思维的新发展。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思想路线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进程，而且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科学的思维方式，这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思想保证。

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和发展有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它是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中不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进而对各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倾向的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之际，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完整准确地把握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对于搞好新时期党的思想建设，实现新时期党的总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的思想基础。如何理解和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本国实际的关系问题，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取得本国革命胜利的关键环节。早在1919年，列宁就提醒东方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要根据本国的历史条件去运用一般的共产主义理论。遵循列宁的这一教导，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从1921年党的成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我们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同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现实出发，以阶级分析方法为武器，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尽管当时还没有从理论上明确提出思想路线问题，但在这一时期所初步形成的调查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活动相结合的风气，为我们党在后来从理论上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丰富经验。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国情，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和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思想。遵循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一般理论，党的“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指出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特点，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明确了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这是中国从近代以来首次提出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标志着我们党在认识中国社会情况方面的重大进步，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取得的最初成果。

在这期间，邓中夏、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等为解决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开始注重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调查和研究，对构成中国社会主要成分的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和农民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讨。党的“四大”集中了全党的智慧，肯定了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思想，并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毛泽东同志在1925年末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科学地回答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领导力量和同盟军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代表了我们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中国社会结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状况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二)把调查研究的重点转向农民问题，逐步确立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思想。农民问题是理解和把握中国近代社会结构和民主革命运动的钥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被誉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最早进行了中国农村和农民情况的调查。1924年至1925年间，他总结了在调查中所获得的材料，写成了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第一篇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在报告中彭湃总结了深入农村调查了解情况的经过和经验，对推动我们党的调查研究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同志是一位善于把调查和研究统一起来的专家。从1925年初开始，他先后数次到湖南、江浙等省区作农村调查，1926年夏天又在广州主办了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他在讲习所工作期间，不仅邀请彭湃同志给学员作报告，而且亲自拟定调查提纲，引导学员进行农村调查，主编《农民运动》丛刊，刊印农村调查资料。在调查实践的基础上，撰写并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农民问题的政论文章，作出了“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见《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的重要结论。毛泽东等人在这一时期的调查研究活动为后来我们党领导民主革命积累了重要的经验。

(三)注意总结大革命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为新时期自觉提出和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奠定了基础。

注意总结实践经验，包括思想路线方面的经验教训是大革命时期我们党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内容。1924年国共合作实现后，随着国民革命形势的高涨，广东、两湖等地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当时帝国主义、军阀和国民党右派大肆攻击农民运动，党内个别人也产生了错误的认识。毛泽东同志在深入湖南考察的基础上，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给中央的报告，在报告中他热情支持农民运动，指出要推翻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需要在农村造成一个大的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他在调查中发现，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上面所见所闻完全不同。因此，他建议党的领导机关依据真实情况纠正对农民

运动的错误认识和错误处置，以挽救革命。在革命的危急关头，陈独秀由于教条主义地坚持“二次革命论”的右倾观点而拒不支持工农运动，致使大革命以失败而告终。在“八·七”会议前后，我们党不仅从政治上批判了陈独秀的错误路线，而且从思想路线角度对他的错误进行了分析。瞿秋白同志在《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我们党所犯的错误归结起来，就是“书生主义”，“书生式的革命观”，按照“死公式”领导革命，这种唯心主义是同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参见《六大以前》，第722—726页）这表明，我们党在大革命后期已逐渐认识到解决思想路线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上述事实表明，我们党还在幼年时期就积极领导工农群众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为探索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老一辈革命家对调查研究活动的倡导和推动，初步形成了我们党的从实际出发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在土地革命时期自觉地提出和形成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 二

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的兴起，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大的历史性转折时期。这一时期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理论化时期。毛泽东同志从1927年起到1934年离开中央苏区的七年中，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对新时期提出的许多紧迫问题进行了艰苦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造，在正确解决有关中国革命道路这一重大政治问题的同时，提出并形成了以调查研究为特色的思想路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把马列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环境，深入总结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和开展土地革命的经验，初步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从1928年10月到1930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井冈山斗争和各地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的基础上，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一系列著作，把马列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环境，揭示了旧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状况即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结构和规律，阐明了红色政权能够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提供了客观依据。此后，毛泽东同志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批判了“城市中心论”，提出了党的工作重点应由城市转向农村，把建立和发展农村根据地同夺取全国政权联系起来，从而初步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邓小平同志指出：“马克思、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这个原理在当时世界上还是没有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了革命的具体道路，在军阀割据的时候，在敌人控制薄弱的地区，领导人民建立革命根据地，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了政权。……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能提出和解决这样的问题吗？能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吗？”（《邓小平文选》，第121—122页）

（二）从实际出发，对农村各阶级的状况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逐步制定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土地革命路线。土地革命时期，是毛泽东同志调查、探索农民问题最重要的时期。从1928年底到1934年，毛泽东同志先后做了寻邬、兴国等十余个调查，对农村各阶级的经济状况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研究，于1933年写出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此文是毛泽东同志多年来农村调查工作的概括和总结，成为我们党划分农村阶级的政策性文件，使党在农村

的阶级路线有了统一的政策依据。

如何解决地权问题和富农问题，是关系到土地革命成败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当时共产国际的代表和党内王明等人，把苏联的土地国有化原则和消灭富农的政策，不顾地点、条件硬搬到中国来，给土地革命斗争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先后遭到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等同志的抵制和纠正。毛泽东同志始终把调查研究作为制定方针政策的基础，他通过调查发现，过去执行土地归苏维埃所有的政策，使得农民感觉田不是自己的，因此不安心耕种。他在调查中还发现，如果执行消灭富农的政策，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入孤立。正是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为中央苏区制定了一条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的正确路线。

(三)在土地革命初期，毛泽东同志对自己从事和倡导的调查研究工作进行了总结，针对党内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提出了把调查研究作为党的各项政策基础的辩证唯物论的思想路线。1929年12月，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央9月来信的精神起草了古田会议决议。在这个决议中，把调查研究工作提到了肃清主观主义的高度，明确提出要对党员进行“正确路线的教育”(《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3页)。这里所说的正确路线就是指党的思想路线。它的基本内容是：第一，教育党员用马列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第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古田会议决议是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件，在这个文件中已经包含了要把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

为了同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1930年5月，毛泽东同志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这是一篇理论联系实际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是同教条主义作斗争的哲学总结，因此，它在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首先，它第一次科学地提出了“思想路线”这一概念，指出了两条思想路线的对立，一条是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一条是按本本、按一成不变的“既定办法”行事的主观主义思想路线。其次，明确指出“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强调调查是取得正确认识的唯一办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本前提，提出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作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结论。第三，它首次明确地提出了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告诫全党“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社会调查”是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第四，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党的正确斗争策略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号召各级领导要到群众中去作实际调查。这篇文章不仅标志着我们党的以调查研究理论为特色的思想路线的创立，而且初步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个基本点。

(四)土地革命后期即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理论成熟和全面发展的阶段，构成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要著作也多数写于这一时期。在同党内历次错误路线的斗争中，毛泽东同志认识到，党内缺乏正确的思想路线乃是错误政治路线得以盛行的主要原因。为防止类似情况的重演，为使全党真正担负起领导全国人民正确进行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历史重任，就必须全

面、深入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为在全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主要做了如下阐述：

1936年12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它不仅是一篇军事理论著作，而且是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来解决党在军事路线上的争论所作的总结。文章开篇就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了三个彼此相关的概念：战争的规律、革命战争的规律、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明确指出：“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在文章中，毛泽东首次提出研究问题“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同上书，第157页）的重要观点，把研究事物的特殊性作为整篇文章的基点，深刻地揭露并批判了教条主义的公式化的错误和思想根源。

为了从世界观上解决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把马克思主义化为人们在实践中必须遵循的思想路线，1937年7、8月间，毛泽东同志撰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两部哲学著作，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基本思想，为党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为我们党批判和清算主观主义提供了锐利的哲学武器。《实践论》坚持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思想，强调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理论的基础是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也只能是实践。明确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它们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在《矛盾论》中，他集中阐述和发挥了对立统一这个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创造性地提出了矛盾问题精髓的学说。文章把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指出不仅要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尤其要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成为人们认识基础的东西，正是事物的特殊性。文章着重强调了这一思想：事物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和个性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不仅抛弃了辩证法，也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样，就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联结这个核心问题出发，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一根本原则提供了理论依据。毛泽东同志的矛盾问题精髓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独特贡献，它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是着眼于中国革命特点的哲学理论。

### 三

从1937年开始的抗日战争及其后的解放战争，迎来了我们党成长、壮大直至取得全国革命胜利的新时期。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写下了一系列光辉著作，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创造性地运用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不仅丰富和完善了“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6—627页）革命的基本理论，而且系统地阐述了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思想路线。特别是在1941年以后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了一次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教育，为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和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实现准备了思想条件。毛泽东思想是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这期间，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对党的思想路线的发展和完整表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把从实际出发确定为制定方针、政策的基础，重申“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多次强调，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从客观真实的

情况出发，而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只有从实际出发，才能从其中引出规律，找出解决问题的方针、政策、办法来。毛泽东同志强调要把客观实际作为决定工作方针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认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必须时刻牢记的最基本的方法。这就把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建立在科学唯物主义的基础上。

为了坚持和发扬党的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同志于1941年3、4月间写了《〈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同年8月，党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等文件，以推动调查研究工作的进行。在《农村调查》序言中，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要了解情况，唯一的办法是向社会作调查；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尤其重要的是，他把调查研究看作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根本途径之一。他说：“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同上书，第749页）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调查研究”是一个带有综合性特征的范畴，其中包含的调查实践环节和理论研究环节体现了完整的认识过程，是一个从感性具体到抽象再到理性具体的认识运动过程。张闻天同志在《出发归来记》一文中，总结自己多年的体会，对调查研究的思维行程作了理论的概括，认为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认识这个事物的整个思想运动的过程。这就是从模糊的、笼统的具体印象到抽象，再从抽象到明确的、充满丰富内容的具体概念之认识过程。”这一见解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调查研究理论。

（二）全面地揭示了实践与理论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辩证联结，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既是中国革命的根本经验，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向全党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同上书，第500页）1939年7月，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号召共产党员要“熟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同时又着重调查和分析活生生的现实，研究自己所处的时代和本国无产阶级所处的各方面情势的特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刘少奇同志的这一论述是我们党内较早较全面地阐发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论断之一。1939年5月后，毛泽东同志在艾思奇编的《哲学选辑》一书的批注中，明确地把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提高到哲学党性的高度，深刻地批判了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倾向。他明确指出，“爬行经验家和辩证法家的原则区别”，就在于他们的“反理论倾向的错误”（《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21、441页）。在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他谆谆告诫全党决不能生吞活剥、形式主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认为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到头来只能被人民所抛弃，成为向隅而泣的可怜虫。1942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对理论联系实际作了明确的规定，即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丰富的实践经验提高到应有的理论高度，对中国的实际问题给予科学的分析和理论的说明，“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

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78页）。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述，为在全党树立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的革命学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把实事求是确定为党的辩证唯物论的思想路线的基本点。“实事求是”在中国历史上，主要是指一种切实的治学态度和学风，尚未形成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范畴。毛泽东同志把它从中国古代思想中提取出来，并赋予它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内容，把它改造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概念，体现了唯物主义的客观性原则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问题精髓理论的有机统一。用“实事求是”表达党的思想路线，体现了毛泽东同志把历史知识、现实经验和哲学理论熔于一炉的思想特色。从30年代末到抗日战争胜利，毛泽东反复向全党强调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首次使用“实事求是”概念：“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同上书，第488页）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再次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把实事求是同理论与实践的一致统一起来。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同志对“实事求是”进一步作了科学规定，他指出：“‘实’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同上书，第759页）1942年，他应彭真同志之邀，为中央党校题写了“实事求是”的校训。1945年，毛泽东同志又为“七大”纪念册作了“实事求是，力戒空谈”的题词。陈云同志最近指出，在延安的时候，我曾经仔细研究过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当我全部读了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之后，感到里面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陈云同志同浙江省领导谈怎样做到实事求是》，载《人民日报》1991年1月18日）可以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全部经验的结晶，是他对自己的哲学思想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概括。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

（四）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统一的原则，系统地阐述了贯彻党的思想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如何把思想路线贯彻到革命实践并保证革命胜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化为一整套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使之走出纯理论的范围，与党所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结合起来，真正成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最根本的就是要遵循理论与实践、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原则。而要解决好这个“结合”问题，关键的一环在于把握中国革命的特点。为此，毛泽东早在30年代，就提出了调查研究的方法和研究矛盾特殊性的方法，这些方法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原则。在40年代，毛泽东同志为了加强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撰写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等一系列文献，把战争年代提倡的“群众化的方式”上升为科学理论形态，系统地制定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并指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这里，毛泽东同志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转化为党的群众路线，同时也把群众路线提高到认识论的高度做了理论概括，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认识论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统一起来。群众路线的提出，不仅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作了重要的补充和发展，而且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独特的贡献。

## 四

延安整风运动的胜利，使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它不仅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思想条件，而且为我们党解决民主革命的遗留问题，完成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提供了思想路线的保证。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国民经济恢复之后，提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我们党没有简单地套用苏联模式，而是科学地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实行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赎买的改造运动。这是我们党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创造的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1957年以前，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一时期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

在中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我们党在历史发展的新时期所面临的重大课题。社会主义到底怎么搞，全世界都还在实践中摸索，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同民主革命时期一样，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也有一个从不懂到懂、逐步积累经验的过程。这期间，最重要的是要坚持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事实表明，我们所面对的情况，并不是马克思最初所设想的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如果离开经典作家论述的历史条件，照搬书本、过早地限制和取消商品生产，以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越大越公越好，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以阶级斗争为纲，就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从5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多次曲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特别是延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极大地破坏了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使国民经济滑向崩溃的边缘。这是我们党在成为执政党以后所遭受的最大的挫折。

1976年10月，胜利地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内乱，从而使我们党实现了新的历史性转折，迎来了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正确分析社会性质和国内外形势、认真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阶段。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他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一系列论述，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生产标准论断，以及有关“一国两制”设想的提出等等，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都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要发展。邓小平同志恢复和发展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围绕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中心问题展开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统一起来，赋予党的思想路线以新的时代内容。

1975年，邓小平同志在遭受长期打击后重新出来工作，当时正是“四人帮”暴戾恣睢、猖狂之极的时候。面对这种形势，邓小平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提出了以党的整顿为核心的全面整顿的方针。针对党内个人迷信盛行、把语录当圣经的恶劣风气，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在《各方面都要整顿》一文中，

他严正指出，党内存在一种把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来的庸俗化做法，“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邓小平文选》，第34页）告诫全党，在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我们党面临着实现历史性转变的艰巨任务。当时的情况是，旧的教条主义、实用主义束缚没有解除，又出现了新的“凡是论”的枷锁。在历史转变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第一个站出来，对“两个凡是”进行批评，明确表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冲破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禁锢，从过去僵化的理论和观念模式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实事求是与因循守旧是不相容的，要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内在要求。不打破在“四人帮”时期形成的思想僵化，不破除本本主义，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就不能树立起来，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邓小平同志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同上书，第133页）解放思想的实质就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树立科学的态度，摆正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邓小平同志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同上书，第323页）邓小平同志把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联系起来决不是偶然的，它同特定的历史环境紧密相关。从僵化模式中解放出来，在当时对于确立党的思想路线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正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在新时期的表现形式，因而具有时代的特色。

（二）阐明了“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

邓小平同志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实事求是是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地位。首先，实事求是是在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他指出，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实事求是。我们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就要抓住它的实质，就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把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实质概括为“实事求是”，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是用最简洁的语言指出了实事求是是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为在思想理论上拨乱反正、肃清“四人帮”造成的混乱，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其次，实事求是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唯物论的基石。邓小平同志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同上书，第109页）邓小平同志这里所说的唯物主义，不是指旧唯物主义，而是由马克思所创立的“完备的唯物主义”，即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第三，实事求是是在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光辉体现，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邓小平同志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同上书，第133页）从而强调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的指导作用。

（三）恢复实践标准的权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引进党的思想路线。

早在1978年，邓小平同志就高度评价了当时在全国展开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他指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同上书，第176页）到了1980年，他又进一步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

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同上书，第242页)后来，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中关于党的思想路线的表达增添了这个重要内容。这个新的概括无疑是对过去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是对党的思想路线的新认识和新发展。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大党，搞现代化建设，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前进。他在谈到“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总方针时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按“一国两制”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的国家包括不同的制度，马克思没有讲过这个问题，我们大胆提出了，如果不这样设想，绝对不能统一。事实证明，“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不仅是处理国家内政问题上的独创，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一个新贡献，为国际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范例。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邓小平同志还把实践标准推进到社会历史领域，提出了生产力标准问题，深化了人们对党的思想路线的认识。他在1978年就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同上书，第123页)后来又进一步指出：“要以是否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工作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2页)生产力标准问题的提出，表明我们党不仅把实事求是作为认识论的命题，而且作为历史唯物论的命题，把这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了。坚持实践标准，最根本的是要坚持生产力标准；所谓从实际出发，就是从中国现有的国情出发，从生产力发展的现有水平和需要出发来考虑一切问题，来安排大政方针。只有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力标准的原理，才能真正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理解我们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七十年。党的以实事求是为根本点的思想路线的发生、发展和胜利的历程，就是对这一结合的“关节点”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事实证明，没有一条着眼于中国实际和中国特点的思想路线，就没有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这是从党的历史发展中所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 近年来我国哲学的若干热点问题(续)

邢 贲 思

### 四、关于理性与非理性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哲学界、心理学界、教育界以及文艺界对理性、非理性的问题讨论得也比较热烈。1983年教育界的一些同志写文章讲到,我们过去对中学生、小学生着重进行智育方面的教育,后来也注意到了德育方面的教育,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对智力教育以外属于非理性范围的教育,比如意志、性格方面的培养等重视不够;意志与性格不是属于智力方面的东西,不是属于认知范围内的问题,有的中小学教师呼吁,要重视对孩子进行这方面的培养。他们认为,现在有一些孩子智力方面相当发育,但是性格与意志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而且往往智力越发达、越聪明的孩子,意志往往比较薄弱,当然也不一定完全成反比。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教育界相当重视,提醒我们在青少年教育中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接着理论界、哲学界、心理学界以及文艺界对理性、非理性问题的讨论也就比较多了。有的同志的文章提出了一个概念,叫作主体结构的非理性方面,还有的同志的文章称之为心理结构的非理性方面。这些文章都谈到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这个主体仅仅依靠认识形式来保持同外界的联系是不够的,因为客观世界的信息纷繁复杂,而且数量很大,人单靠认知这种形式去把握大量来自客观的信息是做不到的。所以人还需要依靠心理结构方面的其他一些因素,包括某些非理性方面的因素来保持同客观外界的联系。这些年来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不少,而且某些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同志也很关心这方面的问题,他们提出要重视科学发现中的直觉作用。文艺界的朋友则谈得更多了,不少人强调灵感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有些人在文章里列举了大量例子、大量的调查材料,证明灵感确实是存在的。有人根据一些艺术家的传记,说明某些艺术家的很著名的作品,一部分是在做梦的时候形成的。比如意大利作曲家、小提琴家塔提尼,他有一首名曲叫《魔鬼的颤音》,据说这首曲子是他在做梦的时候,梦见了撒旦奏出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曲子,醒来后很快地把它记下来,经过整理加工而形成的。有人甚至于说德国著名音乐家瓦格纳的《莱茵的黄昏》和《歌唱大师》里面的某些乐章也是根据梦中的景象谱写下来的。这听起来当然很离奇。但这个问题到底应当怎么解释?灵感也好,直觉也好,就是人的主体结构里面的某些非理性的因素,对这些因素我们究竟怎么看?除此以外,还有一些人的文章里面提到情感、意志、性格、情绪也应当是属于主体结构里的非理性方面。后来由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影响比较大,而弗洛伊德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无意识,因此有人认为无意识也属于非理性的因素。关于非理性方面究竟包括哪些因素,学术界的看法不完全一样,但是有一点看法是一致的,就是人除了认知这种形式外,还会通过大量的非理性的因素来接触外界,掌握外界的各种信息。